

如何有效地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建构中国话语?*

——读施旭的英文专著《中国话语研究》

王 宁

(清华大学外文系 北京 100084)

Shi X. 2014. *Chinese Discourse Studies* [M]. London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V + 240pp.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6038(2015) 05 - 0086 - 04

DOI:10.13458/j.cnki.flatt.004176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便想到要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发出中国的声音,甚至提出要建构中国的学术话语,当然,有这样一种愿望是很自然的,同时也是十分必要的。确实,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被公认为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这一点一开始主要体现于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它也开始逐步体现于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但是由于后者属于一种软实力,处于强势的西方世界并不是那么迫切地需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和人文学术,因而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就难以像政治和经济那样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样看来,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较之前者依然是步履艰难。面对这一状况,我的一些人文学界的同行曾经天真地认为,既然中国变得强大了,外国人就会主动来找我们,希望将我们的著述翻译成外文在国际上出版发行。但是几年过去了,我们仍在不遗余力地翻译并介绍国外,主要是西方的,最新理论和学术著述,而我们中又有多少人得到国外出版机构的青睐呢?又有多少在国内名声赫赫的学者的著述被译成外文在国际上出版了呢?据我所知,其中的幸运者实在是寥寥无几。即使一些学者凭着自己的实力和人缘关系有幸获得了中华外译项目的资助,但是真正进入国际主流出版机构的佼佼者实在是寥若星辰。也许我被不少人看做是其中的少数幸运儿,但说实话,包括我本人在内,如果不去积极推介的话,也很少会有国外出版机构前来找我们的。我的英文著述和论文全是我自己直接用

英文撰写的,我的一些被译成其他语言的著述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英语的中介,即我先发表了英文著述,然后才被译成其他语言的。有鉴于此,我们将采取何种对策来促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呢?我的策略是,除了自己在一些国际学术刊物上编辑关于中国研究的主题专辑外,更要提醒国内的学术同行去共同努力,这样才能有效地促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早日跻身国际学界和出版界。因为在我看来,将中国文化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推向世界,从而在国际学界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光靠少数人孤军奋战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我们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这样十分微弱的声音很快就会被淹没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众声喧哗之中。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推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方面,我本人并非孤立无援,而是得到了国内外许多学界同行的响应和支持。他们凭借自己的研究实力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的同时,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结集提交给国际著名的出版机构出版。在这为数不多的人文学者中,施旭就是一位成绩斐然者。他最近在国际权威的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的专著《中国话语研究》(*Chinese Discourse Studies*)^①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

也许国内学界的一些人会问,在名家如云的中国当代人文学界,施旭何许人也?这大概和他本人一贯的低调行事作风和不事张扬有关。在评论他的这本新著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对施旭其人作一简单的介绍。我和施旭的相识纯属偶然,其间虽然中断了十多年,但一旦重续这段缘分便得以持续至今。二十五年前,刚在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的我,有幸

基金项目:本文受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项目编号:14ZDA15)的资助。

作者简介:王宁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英美文学和西方文论

获得荷兰皇家科学院的博士后基金,师从已故国际比较文学大师和欧洲汉学泰斗佛克马教授在乌德勒支大学从事后现代主义研究。而此时的施旭,作为一位来自军队院校的访问学者,刚刚结束一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访学,正准备继续留下来攻读博士学位。我们都知道,中国学者若想在美获得奖学金也许会有很多机会,因为美国的大学毕竟很多,这里不行还可以到那里去,最终总能找到机会。而在只有两千多万人口的荷兰则不然,要想获得文科的博士研究生奖学金是十分困难的,除了机会极少外,荷兰大学里的博士研究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就是一个工作岗位,一旦你获得这个岗位,你就要从事一些教学或科研工作。当时的荷兰诸所大学中,只有莱顿大学有汉学院。我们就是在这里相识的:他作为一位来自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博士生,兼任莱顿大学汉语教师每周前来上几节课,而我则作为来自乌德勒支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应莱顿大学汉学院教授伊维德的邀请每两周前来参加他主持的中国当代文学研讨班,并作了三次演讲。施旭除了专业是英语外,还自学了荷兰语,另外给外国人讲授汉语无疑也使得他有了对外汉语教学的直接经验,这些都为他后来从事中国当代话语研究和建构奠定了基础。但具有悖论意味的是,施旭学成后又在英国教了几年书,而且回国以来并没有沿着传统的语言学研究之路走下去,也没有进入颇具声势的文化理论讨论和争鸣中。他甘愿寂寞,独辟蹊径,硬是走上了一条自己认准的道路,而且坚持不懈地走了下来。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他创立的浙江大学当代话语研究中心已经有了广泛的国际影响,而他担任主编的英文刊物《多元文化话语》(*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也在问鼎国际权威的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的过程中。在当今的中国人文学界,提到话语分析和中国话语的研究和建构,要想绕过施旭的著述大概是很难的。现在他又推出了这部既有着扎实的研究基础又不乏理论洞见的学术专著,更是确立了他在国际学界代表中国学界发言的资格,真是令人欣喜。至少在我看来,我的孤军奋斗又增加了一位颇具实力和潜力的同盟军,我自然感到十分高兴。因此当施旭把他的这部专著的电子版发给我并希望我为之撰写一篇书评时,我确实是难以推辞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要花费时间去撰写这篇书评呢?道理很简单,其一是我确实被他的这种探索和建构精神所打动,其二则因为他在书中确实提出了一些我曾想到而且也提出过但并未深入展开的论题(王宁,2010,2012,2013,2014)。因为我自己在探索和建构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话语时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和困境,因此阅读他的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和他进行讨论和对话。正如施旭所看到的,由于袭来已久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作祟,被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传播方式、分析方法以及批评标准和讨论的话题,几乎都是从美国-西方的中心地带提出,然后辐射到边缘地区,并在非西方国家的学界得到毫无保留的呼应和接受的(p.4)。即使人们可以说,难道在美国风行一时的理论不是从欧洲传过去的吗?当然,但我们马上又可以进一步追问下去,如果这些理论不经过美国或英语世界的中介能成为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吗?再进一步问下去:这些理论家,如德里达和哈贝马斯如果不先在美国出名能够顺利地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语境吗?这两个问题已经在我最近在德国和法国的几所大学所作的题为《法国理论在中国以及中国学者的重构》(“French Theories in China and Chinese Reconstruction”)的演讲中得到了证实。因此,这样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随着来自西方的话语的扩展和全球化,另一些文化共同体的人们便陷入了“失语”的状态,他们的学术研究也受到了公然的忽视甚至忘却(p.5)。对此施旭感到深深的忧虑并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他看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这种人为的中心/边缘二分正在被逐步打破,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的话语分析和研究依然远远达不到具有普适性和文化上的中性之地位(p.13)。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提出中国话语的建构就是势在必行的了。在建构这样一种话语的过程中,施旭的策略是“全球本土(global)”的立场,也即一方面要“立足本土(locally grounded)”,但同时又要“放眼全球(globally minded)”,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出一种既有着中国的本土/民族特色、同时又能在与具有普适意义的西方主流话语进行交流和对话中为他们所接受的话语方式。他的这种立场通过这两个关键词从头至尾贯穿在他的这本书中。我不禁想起一句十分流行的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其

实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也即越是民族的就越是有可能是有可能走向世界,但必须找到促使其走向世界的中介。这个中介就是翻译,或者说话语表达方式。因为我始终认为,翻译的形式多种多样,直接用外语著述也是翻译的一种形式,而且在当下促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方面,这种翻译的形式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当我读完施旭的这本书后,不禁感到我的这个论点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他的不少观点曾用中文表达并在中国的期刊和出版社(施旭,2010)发表过,因而在中文的语境下也产生过一些影响。但是正如施旭所认识到的,在中文语境下产生影响并不意味着在整个国际学界产生影响。而且面对中文读者写作与面对英文读者写作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其中除了语言上的差异外,还有文化上的差异,此外还有表达方式(话语)上的差异。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他的这部专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用中文已经思考过的一些问题的翻译,但是这种翻译绝不是逐字逐句的翻译,而是一种整体的文化翻译。我认为,在当前促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这种文化翻译应该能起到主要的作用。因而在这个程度上,施旭已经达到了有效地将中国文化的精神和本质特征用英语世界的读者能够接受的方式加以表达的境地。

诚然,正如施旭所意识到的,“应该清楚地明白,建立和巩固集体的东方话语研究范式的目的既非要取代现存的西方主流话语,也不想推倒更具有文化具体性的研究模式。因此它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总体的框架,也即这一框架不仅在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范式的批评性对话中起到某种制衡的作用,而且要能对建构特殊的东方的研究方法的努力起到指导作用(p. 42)。当然,对于这种东方的模式究竟为何物,施旭也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即它并非是要所有东方国家的研究者都依循一种模式,而是说这种集体的标准能够有效地协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学者在一个全球本土的活动场域中巩固他们的知识研究的效果(p. 52)。而在具体的处理方式方面,施旭则举了两个颇有中国的话语代表性但又十分棘手的例子:中国的人权表达方式和在世贸组织谈判中中国代表的表达方式。在谈到前者时,他并不回避人权这个敏感的字眼,而是提醒西方学者注意,“中国的人权话语表达方式在其语用特征和地位上已经有

了较大的变化(p. 133),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人权的标准来描绘中国的人权状况。西方所强调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利,而中国则强调的是作为整个民族的整体的人的权利。在这方面,不同的话语所表达的意思显然是大相径庭的。同样,在针对欧盟的反倾销诉讼方面,中国人也不应该简单地用一种中国特有的方式来抹去中西文化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经济的扩展和交往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单一的经济问题,也不应该以单一的经济方式来解决(p. 170),运用恰当的话语表达方式也许能起到一定的效果。我想这都是具有洞见的观点,也是施旭通过长期的思考和小心的求证所得出的结论。

尽管我还想继续读一读施旭究竟在建构中国话语,尤其是人文学术话语方面有何高见时,他却止步了,因此难免不留下一些遗憾。好在他在结论中已经意识到这个缺陷,并希望他自己以及学界同行就这个问题进一步探讨下去。我想,无论如何,施旭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应该说是基本达到了。而提出的一些问题则为后来的研究者的继续努力铺平了道路。写到这里,我想在肯定施旭的专著之价值的同时也提出我本人的一些思考,以便和施旭以及广大读者一起分享。

首先,我要进一步回答国内同行的这一看法:将中国文化,包括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译成外文,应该是目标语学界的任务,如果他们需要就会花大力气去翻译我们的著作,这一点中国学者是无法做到的,因此我们只能等待国外汉学家去翻译我们的著作,而无须花大气力将自己的著述译成外文。显然,他们的理由是,在当今的中国学界,能用外语著述并达到在国际学界出版水平者实在是凤毛麟角。这确实是一个不争之实,它由此也对我们的外语教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毕竟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队伍,其中有不少人曾多年留学世界名校,并直接用外语著述,在国际权威刊物或出版机构发表。应该说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潜在的力量:这批曾在国外留学多年并获得学位后回国任教的中青年学者有着深厚的中外文造诣和文化理论功底,他们完全可以直接用外文著述,将(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国内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

评述和总结的方式介绍给国际学界。再加上那些毕业后仍留在国外大学任教的华裔文学和文化研究者的努力著述,中国的文化至少在国际文化学术界不至于陷入“失语”的状态,而应该不断地发出日益强大的声音。即使他们的外文著述的初稿在经过国际同行审读后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他们也可以自己去独立完成,而不必先写出中文,然后再请译者帮忙了。对于这一股力量的潜在作用我们绝不可低估。

其次,我们还应该培养一支外语素质高、中国文化学术功底深、语言表达地道的高级翻译队伍。目前,在中国的高校中,建立所谓的“高级翻译学院”已成为一种风气,但究竟有哪所高校真正建立了一所达到上述标准的高级翻译学院呢?据我所知,大多数这样的高级翻译学院的水平仍停留在简单的口译技巧的训练上,并未达到将中国人文学术成果译成优秀的外文并达到在国际出版机构出版的高水平。那么我们将如何突破这一瓶颈呢?我认为,我们不妨采取中外合作的方法,一方面通过中外合作办学的方式让我们的学生在校期间至少有一年以上的时间到所学的那种语言的国家去深造,使得他们的语言表达地道;另一方面则聘请高水平、负责任并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将这些翻译出来的半成品修改润色成完美的成品,使它们能达到在目标语出版机构出版的水平。在当前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困难的。

最后也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则是:借船出海或借鸡下蛋,即借国外的出版社或学术期刊发表我们的著述,这样就能解决在国际市场发行流通的问题。我这十多年来正是这样去做的,施旭也是这样去实践的:十多年前,当国内外语界的学者还踌躇于如何在中文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时,他却目光敏锐地和国际权威出版社商谈出版一个以“多元话语”为对象的英文学术期刊,以便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一

统天下的局面。尽管他经常为了某个专题去邀请世界各国学者撰文或编辑主题专辑,但毕竟不需要为了刊物的发行和资金问题去奔波。目前,这方面的效法者已经越来越多,可以预言,随着国际英语学界中国声音的日益强劲,中国人文学术话语的建构就不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式的空想。我这里也殷切地希望我的国内同行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

通过上述三个途径,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走向世界进而建构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就必定能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旭的这部专著在英语世界权威出版机构的出版就显得十分必要。当然,我也期待着更多的出自另一些学者之手的专著早日在国际出版机构问世。这样我们就可以以极大的热情欢呼“全球人文”时代的来临(王宁, 2011)。

注释:

①Shi X. 2014. *Chinese Discourse Studies* [M]. London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文中引文除标明出处外均出自该书,本文仅在括号中标明页码。

参考文献:

- [1] Shi X. 2014. *Chinese Discourse Studies* [M]. London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2] 施旭. 2010. 文化话语研究: 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3] 王宁. 2010. 从单一到双向: 中外文论对话中的话语权问题 [J]. 江海学刊 (2): 29-35.
- [4] 王宁. 2011. “全球人文”与人文学科在今天的作用 [J]. 探索与争鸣, (8): 8-12.
- [5] 王宁. 2012. 中国文论如何有效地走向世界? [J]. 学习与探索, (11): 122-125.
- [6] 王宁. 2013. 中国文化走出去: 外语学科大有作为 [J]. 中国外语 (2): 1, 11-12.
- [7] 王宁. 2014.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中国的声音 [J]. 探索与争鸣, (1): 4-8.